

论朱绪曾的文献学成就

——以《钊有益斋读书志》为例

卓 越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北京 100875)

Zhu Xuzeng, as a scholar in late Qing dynasty, studying all his life, had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field, especially in the Bibliography and Correction. He thought the needs in reality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cademic research, holding the banner of patriotism, and devoted to the practical lear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reflects the academic contex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Zhu Xuzeng Bibliography JiaoKanXue Edition Application

内容提要 晚清学人朱绪曾, 砥砺学术, 一生不辍, 在文献学领域卓有创获, 其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成就尤为突出, 以现实社会的需要视为学术探究的动力,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力倡求真求实的致用之学,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学术脉络。

关键词 朱绪曾 目录学 校勘学 版本学 学以致用

中图分类号 G254.31

文献标识码 A

朱绪曾字述之, 号北山, 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生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1], 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 终年56岁。金陵朱氏世富藏书, 所居秦淮水榭, 藏书十数万卷, 其家学可谓源远流长, 受家庭环境的熏陶, 朱绪曾自小就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 一生不曾释卷, 且勤于耕耘, 著有《续宋文鉴》、《中论注》、《论语义证》、《金陵旧闻》、《金陵诗汇》、《笔谱》、《曹子建集考异》、《昌国典咏》、《续棠阴比事》、《钊有益斋集》、《读书志》、《金陵朱氏家集二十九种》、《曹集考异》、《梅里诗辑》、《国朝金陵诗征》, 称得上是道咸年间“研经博物、闻名东南”^[2]的一位名贤。

作为学者的朱绪曾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即为晚清政府一名地方官员。朱绪曾为官亲民、恤民, 爱民深切, 因身处社会基层, 尤为了解民生疾苦, 自是不惜余力的以身事民, 面对外来侵略, 主张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不作丝毫妥协, 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朱绪曾丰硕学术成就的身影背后, 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 换言之, 也可以说朱

绪曾学术探究的动力源自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者的结合在朱绪曾身上体现的更为密切。

朱绪曾在学术研究上一脉于乾嘉, “沿乾嘉考据之末流……”^[3]其考证史俨然有法, 但厌其琐碎, 痛绝其不闻事务, 皓首穷经, 埋首于故纸堆的无识之举, 倡导学贵于用的真学问; 正因为如此, 朱氏本着求真求实的学术思想研经治史, 拓深了乾嘉一派学术精神的内涵, 高扬了我国古代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 具有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目录学成就

(一) 新的书目体裁

读书志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的著录方式,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 但晁书仍是作为一般书目的体裁来编写的, 保留了传统的名目、大序、小序、解题等体例。到了清代涌现出大批藏书丰厚的学者, 他们不特为自身的藏书作简单登录, 而是利用其藏书积极地进行学术研究, 在读书、考订的过程中写成读书札记, 以此

表达个人的学术心得和学术见解,久而久之,便衍生为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目录学专著。正如来新夏先生在《古典目录学浅说》所谈到的“有些学者并非从登录藏书入手编制目录,而是从致力学术研究入手,随读书、研究,随写成读书记以表达个人的心得与见解,这样经过一定岁月的积累便成为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目录学专著,如周中孚的《郅堂读书记》、朱绪曾的《钊有益斋读书志》等都是。”^[14]图书著录与学术研究的双层契合,从而使读书志作为一种特殊的目录体裁真正成熟起来。

以《钊有益斋读书志》为例(以下简称“读书志”),该志是清代学者朱绪曾的一部目录学专著,也是清代私家运用“读书志”体例撰修的典型著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私家修目的最高水平。它的产生,实质上凸现出中国古代学术与中国古代私家目录同向并驱的必然结果。

“读书志”以其独特而新颖的著录方式,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表里统一,不仅为古典目录学的体裁增添了新的类型,而且为古典目录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有力地推动着古典目录学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 分类与体例

《读书志》是朱绪曾在读书治学之余的自得之作,其分类与体例在源于传统的基础上并有所突破,既体现出了时代的学术特色,又展现出朱绪曾本人的学术特点,是一部非常有内在价值的私家目录。《读书志》在分类体系上依《四库总目》对所收文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设类,凡三十类,具体如下:

卷一、经部:五经 四书 小学类

卷二、史部:正史 别史 奏议 传记 史钞 载记 时令

卷三、史部:地理 山水 古迹 杂记 游纪 异域 职官 政书 目录(附金石)

卷四、子部:法家 医家 天算 杂家 类书 小说 道家

卷五、集部:别集

卷六、集部:总集 诗文评 金石文字记

各部类收录的文献数量情况为(包括续志):经部 23 种;史部 42 种;子部 20 种;集部 77 种,共收录文献 162 部。

《读书志》作为一部特殊体裁的私家目录,是朱绪曾平时所作读书札记的汇编,不特为登录藏书而编写,因此就不再有《四库总目》中的总序、小序之属,不再有著录、存目之分,虽然没有总序、小序之属,似乎有碍于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功能的发挥,但“各部类缕析分明、上下有序”^[15],亦能做到如郑樵所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另外,著录、存目二者界限的打破,则无疑提高了各书提要的质量,更方便读者阅读使用,这也是值得我们有必要加以关注的。

就具体类目而言,《读书志》较之《四库总目》有所变更,如史部的部分小类在分类上不同于“四库”,《四库总目》史部把山水、古迹、杂记、游纪诸子目归属于地理类,而《读书志》则把这些子目提升为类,与地理并列,并改“外纪”为“异域”,小类的个别名称也作了改动。把地理一类与山水、古迹、杂记、游纪诸类分开来,地理一类的内容仅仅涉及国家的行政区划和边关险要,这部分的内容与治理邦国密切相关,与无涉治国兴邦的山水名胜区别开来,这是作者的分设类目的匠心所在,充分反映了朱氏寓治世于治学的务实思想。另外,《读书志》把《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所属的“金石”移入集部,把这一子目提升为集部的小类,这一变化一方面归结于金石学自身的发展及金石类内容的扩充,另一方面要归结于朱氏以金石考史的治学目的。由此可见,《钊有益斋读书志》较之《四库总目》其分类体系的变化主要集中于史部,除了体现朱氏对目录分类的新见解之外,也体现了他本人对于史部书籍的重视,反映出朱氏“以史为鉴”的治用史学思想。

《读书志》所涉内容相当广泛,除了每篇篇首列出书名、卷数、著者、著者所处年代之外,详细考察图书的流传情况,考辨图书的版本、真伪,纠校书籍的讹误,评述书的内容与价值,还附载有对撰者的论述及书的刊印情况。

总之,《读书志》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私家修目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完善了自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来,私家以读书志为著录方式的新体裁的运用,丰富与发展了古代目录的体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目录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 广泛的著录范围

读书志作为一种特殊的著录体裁,其著录方式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收录的范围较为广泛,种类也较为繁多。具体而言,《读书志》收录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读书志》尤为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收录。其中大量收录了金陵、浙江地方文献以及金陵人氏、浙人编撰的著作,如反映金陵的风土人情、方志的,收录有《健康实录》、《金陵新志》、《佘谷寺志》等数十种地方文献;反映金陵人的著作,收录

有贝琳编撰的《七政推步》、王贞德的《德风亭初集》等多部典籍。反映部分浙江人著作和浙江的部分地方文献,收录《海昌胜览》、《陆宣公奏议》等多部典籍,并且这部分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读书志》收录了部分罕见文献以及优于或异于《四库全书》所收版本的典籍。明抄本《韩氏三礼图说》两卷,历代艺文志中皆无记载,《读书志》不仅收录了此书,而其还对其内容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平庵悔稿》、《娥术诗词》等都被《四库全书》收录,《读书志》尽悉收录在内。元刻本《四书丛说》较《四库全书》收录的版本更为完整,内容更为完备,其文献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此种种,不一而言。

第三,《读书志》还收录了大量同时人的著作,数量达数十种之多,这部分图书的内容较多的是有关于典籍学术价值的讨论。如李荣陛的《易考》、《尚书考》,管凤苞的《管氏读经笔记续笔记》,辛廷之的《四书解细论》及胡竹村的《四书拾义》等皆是。重视对当代学术典籍的著录,这在当时的私家书目中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可见,朱氏著录评论典籍不单纯地追求孤本、善本,在不忽略版本的同时较多的倾向于典籍的学术价值,更侧重于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考虑著录书籍是《读书志》一大特点。

第四,金石文字的收录扩充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朱氏善于以金石推衍扩充历史史料,以此来推证历史事实,探寻历史的真相,这无疑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如其生前好友刘寿曾所言:“其以金石之文,推证史传,亦与近儒王氏、钱氏、毕氏、阮氏相近,可谓大雅闳达之选矣”^[6]。《读书志》附录了《金石文字记》共30篇,每篇均详述了勒石的出处、原委、内容、文字特点等,为后人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第五,《读书志》还非常注重对当时外国人著述情况的考察,如朝鲜人著作,著录有《荷谷诗钞》、《石洲集》、《正气录》、《挹翠轩遗稿》等几种,可以说从目录学方面考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学术动态。虽然“开有益斋”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朝鲜人的著作,可惜在1853年的战火中尽悉付之一炬,《读书志》仅收录其旅次所携的几种,尽管数量非常有限,但也足以反映朱氏藏书广采博收的特点。朱氏注重收录外国人的著述,并有意地加以比较、说明,予以中肯的评论,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国外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藏书家中显然是不多见的。

总之,就收录情况而言,《读书志》收录范围相

当广泛,不仅充分显示了朱绪曾宽泛的学术志趣及鲜明的学术特点,而且也体现了读书志,这一特殊体裁的清代私家目录广泛的著录范围及独有的著录特点。

二 校勘学成就

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及人为的种种原因,往往出现衍文、脱文、误文、错简以及文章体例的混淆等错误。因此,校勘活动对于研读古籍而言是必要的。另外,校勘方法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校勘活动的成效。《读书志》中虽然没有系统性的校勘方法的说明,但朱氏在广泛汲取前人校勘经验的基础之上,合理、灵活地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系统的校勘,则是一目了然。因此对《读书志》校勘成就的探析有必要从校勘内容及校勘方法上逐层展开。

(一)校勘内容方面

1. 订正书籍文字的讹、脱、错乱。

讹,即文字错误,是典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订正文字是校勘最基本的任务。如《读书志·六朝事迹编类》条,朱氏用《景定志》校明吴馆刊本《六朝事迹编类》,他首先指明《六朝事迹编类》中存在的讹字与脱字,如“李昇讹为李升,窦泉讹为窦泉,杨修之讹为杨修”^[7],紧随其后以双行小字注的形式加以证明,“南唐先主李昇,音弁,日光貌明也,作升,非;唐韦君碑窦泉书,泉古暨字,见《说文》,窦泉作《述书赋》者,泉作泉,非;杨脩字修之,庆历中为尚书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上轻车都尉,《往复江上赋》、《金陵览古百题诗》各注其事于题之下,作杨修,非。”^[8]这种在正文中订讹,并于注文详加说明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校勘成果的可信性,这种做法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脱文,亦称夺文、脱字。古籍在刊刻流传的过程中容易漏掉字句,这种结果会使文章的上下文义不相连贯,文章的意思不能清楚的表达,甚至改变原书的本义,从而有碍于读者的阅读与使用。《读书志》在增补脱文方面亦为留意,如《读书志·景定建康志》条,“《建康志》五十卷,马光祖辈父撰,明南雍藏版散佚,阳湖孙星衍渊如以总督费公淳所藏本重梓行世,张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志》尝言其讹误数处。余于壬子购得宋刊本,卷十三表孙刻少宣和元年己亥至七年乙巳(部分内容)……”^[9]对于孙刻费藏本《建康志》卷十三表大量阙失的文字,朱氏利用所得宋刊本《建康志》进行补充,用小字的形式缀于正文后,以区别于正文部分,这样做既增补了所阙文字,使内容趋于完整,同时又有利于保存典籍的原貌。

错乱,亦称错简,即文字的次序错乱。文字正常的次序一旦发生了变化,文章的文义自然不够畅达,直接造成了读者阅读的困难。《读书志》中对于这类的校勘也是不乏其例,如《景定建康志》“二十一卷《城阙志》四十页以下先后次序紊乱,四十页‘季语告下’应接‘勿替此心,朝斯夕斯,燕兴一堂,无愧此颜……终焉’,‘凉馆轮奂一新下’当接‘宜侈其名’,孙刻先后舛误。”^[10]朱氏对《景定建康志》孙刻费藏本《城阙志》40页以下,次序有错乱的部分文字进行分析排比,恢复其正常的次序,使文义畅达,阅读无碍。

2. 注重校补残卷,力图恢复图书的原貌。

准确申明典籍内容的残缺,利用各种校补手段,尽最大努力加以整合,使典籍的内容恢复完整,是校勘的目的所在。如《读书志·周易象义》条,“丁易东《周易象义》永乐大典本十六卷,阙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乾、晋后四爻。张氏‘爱日精庐’有残本,自丰至未济两卷。汪氏《振绮堂书目》有此书,因假以校之,汪氏本首行标易上经第一之一,此行武陵丁易东《象义》各卷仿此,乃宋本旧式也……汪氏本上经一之一、一之二阙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凡二十卦爻,其象象皆无所阙。以永乐大典本互为补足,仅阙豫、随、无妄三卦爻耳。”^[11]朱氏就丁氏《周易象义》搜罗有三种本子,分别为:大典十六卷本、张氏爱日精庐残本、汪氏振绮堂本;其次审明了丁氏《周易象义》各版本的内容残留情况;再次依据“汪氏本首行标易上经第一之一,此行武陵丁易东象义各卷仿此,乃宋本旧式也”^[12],确定汪氏振绮堂本为优;最后以汪氏本为基础,综合大典本及张氏爱日精庐残本,互为补足,虽然还阙豫、随、无妄三卦之爻辞,但典籍的大貌已隐约可见。显而易见,朱氏的这种治学方法是可信而又可取的。

(二)校勘方法方面

1.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即此法也。”^[13]概括地说,就是用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校出各本异同,不审定各自的是非。“陈垣强调校勘古书,必须先用对校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运用其他方法,并认为这是校勘古书的必由路径。”^[14]朱氏在使用对校法校勘典籍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原本、足本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底本进行校勘。如朱氏读《双峰猗稿》曰:“靖安舒司马恭受,尝校其所藏远祖宋衡州录事参军《双峰猗稿》,余见之曰,非足本也。海

昌吴槎客拜经楼有原书九卷,查初白有跋语……(舒本)当乾隆年间搜采遗书,列于存目,系残缺之本,仅纪干支。无年号,亦无李大异所撰墓志铭,以致淳熙辛丑误为宣和癸丑,移南宋为北宋……”^[15]朱氏用《双峰猗稿》吴氏拜经楼所藏原书九卷足本,与舒藏残本两相比较,指出舒藏本缺少年号纪年及李大异所撰墓志铭,另外纠正了其中的讹误内容。朱氏利用其所藏及所见的原本、足本,运用对校的方法,进行了此类大量的校勘活动,这在《读书志》中随处可见。

2. 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16]这种校勘方法尤为陈垣先生所看重,并认为“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17]。《读书志》用此类方法校勘的内容相当精当,如《读书志·邓伯言玉笥集》条曰:“刘思敬《存征录》云,邓伯言,金陵人,幼游玉笥山,诗有‘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之句。宋潜溪赏之,言于高皇,得召见,令作《锺山晚寒诗》,有‘鳌足立四极,锺山盘一龙’句……今集中《寓玉笥山诗》云,‘楼上一簾青障雨,洞中千树碧桃花’,与刘所载稍异。末一卷《朝京纪行诗》,首为《应制赋》,‘锺山互寒鳌足’一联在第四韵,知‘晚寒’为‘互寒’之讹……”^[18]刘思敬《存征录》所载邓伯言幼游玉笥山所作“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一句,与邓伯言《玉笥集·寓玉笥山诗》中“楼上一簾青障雨,洞中千树碧桃花”稍异;且所作《应制赋》,《存征录》记载为“锺山晚寒”,而邓伯言《玉笥集》中作“锺山互寒”,两相比较,是非一目了然。朱氏以刘思敬《存征录》转录邓伯言《玉笥集》的相关内容对原本进行校勘,是本书中朱氏运用他校法的典例之一。

三 版本学成就

注重版本是我国古人读书治学的优良传统,久而久之,考订版本随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一个理路。《读书志》一方面注重梳理典籍的版本系统,考察版本的源流;另一方面亦注重从典籍的内容入手,考察版本优劣。此外,朱氏还有效地运用多种方法从典籍的形式入手进行版本鉴定。

(一)注重考察版本系统,如《读书志·乾道四明图经》条曰:“《乾道四明图经》十二卷,宋乾道五年直秘阁知明州张津撰,首有缙云县主簿三山黄鼎序,云:‘得旧钞更加采摭著为七卷,又以篇什、碑记等为五卷附于末’。原书无专刻,明郑真编入《四明文献集》,后人采而出之,始有钞本……”^[19]

朱氏指明了《乾道四明图经》在宋代写成后并没有刊刻,后被明代的郑真录入了《四明文献集》,以丛书的方式得以流传,后人又从郑真的《四明文献集》中采摘而出,随后才有单行钞本流传于世。通过对《乾道四明图经》版本系统的考察,其版本源流一目了然。

(二)谨慎评定版本优劣,《读书志》在比较版本的优劣时着重从版本的内容入手,以考察版本内容的完缺作为其评定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法。如《读书志·岁时广记》条曰“宋广寒仙裔陈元靓《岁时广记》,余向得五卷,列图说二十为首卷,四时为四卷,龚半干藏书也。证以《敏求记》,以为足本也。今至范氏天一阁,得四十二卷本,首图说一卷,春夏秋冬四卷,自元旦至除夕为三十六卷,末总载一卷,始为完书,爰传钞而藏之。”^[20]朱氏从考察典籍内容入手,确定范氏天一阁本优于龚半干藏本。

(三)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版本鉴定。由于版本研究最终要从版本鉴定入手,因此清代的学者们把版本鉴定视为版本研究的第一步。朱绪曾亦不例外,但他更为注重从典籍的形式着手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版本鉴定。

1. 依据后人题跋识语鉴定版本。如《读书志·韩氏三礼图说》条曰:“《三礼图说》二卷,元宁德韩信同伯循撰,首有延祐四年霍林陈尚德序……乾隆庚子,苍壁斋主人何善述跋云:‘为高固斋兆所藏,未识乙丑(1685年),迄今九十七年,国初人所得明人钞本也’。”^[21]朱氏以何跋为线索进行考证,知高固斋,名兆,明末清初人;乙丑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依据何善述跋语,朱绪曾认定此本《韩氏三礼图说》为清初所得明人钞本。

2. 依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如《读书志·元平水曹氏尔雅注》条曰:“《尔雅》单注……序后有木记六行云:‘一物不知,儒者所耻,闻患乎寡,不患乎多也。《尔雅》之书,汉初尝立博士矣,其所载精粗巨细毕备,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志。’”^[22]此本《尔雅注》序有木记6行,后云“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志”大德为元成宗的年号,大德己亥为1299年,朱氏考察木记这句话的记载,认定此本《尔雅注》为元刻本。

3. 依据书中避讳字鉴定版本。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现象,尊者的名字就不能直接书写,要采取一定方式避讳,要么改字,要么阙字,要么缺笔,这就为确定版刻的下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这也是版本鉴定常用的方法之一。如《读书志·六朝事迹编类》条曰:“《绪曾》壬辰春,于京师琉璃厂

见曹棟亭家藏本……假是书以临写之,内玄武湖作真武湖,贞观、忠贞,贞皆作正,定为宋本。”^[23]朱氏依据书中“玄武湖”作“真武湖”,“贞观”、“忠贞”,“贞”皆作“正”的避讳现象,认定此书为宋本。

4. 依据字体版式鉴定版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书法艺术,选用什么样的字体,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尚,了解并掌握这些特点,对版本鉴定有一定的帮助。如《读书志·洪武京城图志》条曰:“此明洪武初应天府京城图志也……镂刻精工,字仿赵松雪体……此图志是明初印本,古香触手,与宋元佳刻无异。”^[24]明代刻本,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多赵体字,中期欧体字,晚期宋体字。朱氏以此本《洪武京城图志》字仿赵松雪体,从而断定为明初印本。

四 文献学思想

朱绪曾秉承了乾嘉学派优良的学术传统,倡导学术以考据为务,在最大程度上求真求实。此外,朱绪曾还有意识的把社会的需要与学术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主张学以致用,这无疑是更高层次上的“求真求实”的学术思想。

其一,学术研究不当以空言相欺,要言之有据,言归于用,这正是朱氏“求真求实”学术思想的内在要求。朱绪曾认为其《钅有益斋读书志》言无虚发,曾不止一次的谈到,“吾集序跋最多,与《甘泉乡人稿》相类,无空言也。”^[25]后学刘寿曾所作跋亦称,朱氏所撰《钅有益斋读书志》“为征文考献之资,旁涉校讎,亦多精审,方驾晁、陈,殆有过之。”无论是朱氏自言,还是刘寿曾的称赞,都反映出朱氏反对学术虚言,提倡平实、确凿的学术探究。深入考察《钅有益斋读书志》的内容而言,也确如以上所论。朱绪曾读《台阁名言》,对张和懋辩罗璧“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韵,疑为姜姓假托。”^[26]一条大加赞赏,认为其“明确有据”,而对于不能申加说明的内容,则直斥其“此则不免穿凿耳”,进行切中的批评。此条申说犹可见朱氏“求真求实”学术思想之一斑。

其二,“求真求实”的学术思想还表现在对待学术疑难的态度,对于证据不确,或通过相关证据依然不能够解决的学术问题,朱氏向来不臆断为说,而是弗知阙如,留存疑难,以待来者。如《钅有益斋读书志·輿地纪胜》条,此本是朱绪曾从钱塘许子谔抄录本,仅署名作者王象之,除此之外,对作者没有更多的说明。朱氏考钱辛楣《钅新录藏书》,知象之字仪父,金华人,尝知江宁县。又考元吴师道《敬乡录》,知象之之父名师古,金华人,绍兴甲戌进士,吕忠公为其题写墓志,墓志提到了王

象之字肖甫,庆元丙辰进士,博学多识,著《輿地纪胜》。通过此番考察,知王象之有仪父、肖甫二个字号,但不知孰是孰非。遂又考《景定建康志》江宁县壁记,题名知县自绍兴元年乐某,至景定元年王鏐,亦没有王象之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朱绪曾如实申明,弗知阙如。此外,刘寿曾也曾论及朱绪曾的阙疑精神曰“(朱氏)无书不览,强识博记,研经博物,闻名东南。但不妄断为是,有所不知,盖阙如也。”^[127]也在于言明此意。

其三,面对不同的学术见解,能够虚心接受,不攘善意,也应算是朱氏“求真求实”学术思想的一个方面。朱氏治学喜与人辩论,生平不屑门户之争伐,以“求真求实”为学术皈依,故能采纳不同见解,凡言之有据、言之可信、言之成理者必在采纳之列。咸丰癸丑冬(1853年),朱绪曾客袁江时,见山阳丁俭卿著《陈思王年谱》,认为“确有根据”,便“采其序入集(《曹集考异》)”。^[128]其子朱桂模引丁俭卿《曹集考异·辅臣论》入朱绪曾《曹子建考异》,正是尊其父之志而为。正如朱桂模所云:“丁书所收佚句,有是书所未引者,检寻所据之书,并以类益,而述其事于跋内,以仰承先君生平不攘人之意。”^[129]

其四,认为现实社会的需要是学术研究的动力所在,这是其“求真求实”学术思想的高端显示。道咸年间,随着西方侵略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封建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朱绪曾作为一位地方官吏,亲身参加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鸦片战争,即徐辛庵所言“庚子岁(1840年)鲸波不靖,为蜃雾所蚀,吴越告警……朱述之大令参与谋划……”^[130]面对外国的侵略叫嚣,朱氏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地投入到研究中国沿海地理形势的热潮中,旨在“究輿地以筹边防”^[131],随时为反击外来侵略做好准备。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侵略者曾一度攻陷定海,随即宣称定海非中国所有,在外国侵略者的唆使下,一些人也俯首摇尾,随声附和,即所谓“当海氛未息,议者或疑舟山非中国地”^[132],在这种情况下,朱绪曾写出了《昌国典咏》一书,不仅详述了中国历代政府在舟山的行政建制沿革,用铁的事实证实了舟山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义正词严地回击了当时就舟山非中国领土的种种非议,而且还能够结合现实的需要,注重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道光壬寅英舰犯浙,陷舟山,先生适参军事于定海,既媾和,惩前毖后乃著是编,所以重国防也。而于有明之倭祸,胡梅林、戚南塘之战略,其出没于舟山者,载之纂祥,苟后之有国者借鉴前车

……”^[133]。这一举措不仅充分反映了朱绪曾渊博的史学知识与可贵的爱国思想,更是体现出了朱绪曾学术研究的真实目的,既为现实社会服务,现实需求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真动力。

总之,朱氏“求真求实”的学术思想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前提,重视根据,绝不作泛泛之谈,同时又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切中实际、切求实用的学术研究,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是科学的、进步的。

- [1]甘熙:《白下琐言》第10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
- [2][6][25][27]刘寿曾跋:《钊有益斋读书志》。
- [3]蒋国榜跋:《曹集考异》,蒋氏慎修书屋铅印金陵丛书本1904年。
- [4]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齐鲁书社1997年,第170页。
- [5]陈少川:《朱绪曾图书馆学成就浅析》,《青岛大学图书馆》2000年第2期。
- [7][8][23]《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三史部杂记类《六朝事迹编类》条,第39页。
- [9][10]《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三史部地理类《景定建康志》条,第32页。
- [11][12]《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一经部五经类《周易象义》条,第6页。
- [13][16]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第114页。
- [14][17]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 [15]《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五集部别集类《奴峰猗稿》条,第81页。
- [18]《钊有益斋读书志》集部别集类《鄧伯言玉笥集》条,第91页。
- [19]《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三史部地理类《乾道四明图经》条,第32页。
- [20]《钊有益斋读书志》史部时令类《岁时广记》条,第29页。
- [21]《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一经部五经类《韩氏三礼图说》条,第9页。
- [22]《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一经部五经类《阮平水曹氏尔雅注》条,第16页。
- [24]《钊有益斋读书志》卷三史部地理类《洪武京城图志》条,第36页。
- [26]《钊有益斋读书志》卷四子部杂家类《台阁名言》条,第62页。
- [28][29]朱桂模跋:《曹集考异》,蒋氏慎修书屋铅印金陵丛书本1904年。
- [30][31][32]徐辛庵序:《昌国典咏》,《丛书集成续编》王德毅等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
- [33]蒋国榜跋:《昌国典咏》,《丛书集成续编》王德毅等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